

《顶尖女子》中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in *Top Girls*

刘茂生 (Liu Maosheng) 杨俊婷 (Yang Junting)

内容摘要: 《顶尖女子》是英国当代戏剧家卡里尔·邱吉尔的代表性作品。剧本以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职场女性生存的伦理环境为背景, 聚焦马琳这位当代职场中“顶尖女子”的伦理身份与选择, 书写了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职场女性复杂的伦理生活。围绕马琳伦理选择的伦理主线, 叙述了马琳的多重伦理身份引发的伦理困境以及马琳最终做出的伦理选择, 强调了伦理身份与其他伦理选择具有的不可分割性。邱吉尔的《顶尖女子》通过马琳多重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范例展示当代英国职业女性面临的伦理困境, 警示读者和观众在做出伦理选择时不能忽视身份赋予的伦理责任和义务, 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道德启示。

关键词: 卡里尔·邱吉尔; 《顶尖女子》;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 刘茂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叙事学; 杨俊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系 202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外戏剧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 22&ZD285】、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伦理批评的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 19&ZD19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科研项目【项目批号: CSY-2022-02】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批号: 22GWCXXM-011】资助。

Title: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in *Top Girls*

Abstract: *Top Girls*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dramatist Caryl Churchill. Taking contemporary professional women's survival environment in the 1980s Britain as setting, the play focuses on the "top girl" Marlene's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in contemporary workplace, describing the complex ethical life of British working women in the 1980s. Revolving around the narrative mainline of Marlene's ethical choice,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nseparability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through illustrating the ethical dilemma caused by Marlene's multiple ethical identities and the ethical choices she finally

made. Churchill's *Top Girls* shows the ethical dilemma faced by contemporary British professional women through the example of Marlene's multiple ethical identities and ethical choices and warns readers and audiences shoulder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entrusted by identity when making ethical choices, thus providing people with profound moral enlightenment.

Keywords: Caryl Churchill; *Top Girls*;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s: **Liu Maosheng** is Ph.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cover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arratology (Email: liumaosheng2004@126.com). **Yang Junting** is a doctorate candidate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yangjuntinggdufs@163.com).

卡里尔·邱吉尔 (Caryl Churchill, 1938-) 长达五十年的戏剧创作影响了无数戏剧从业者和戏剧工作者。本尼迪克特·南丁格尔认为她“是所有英国剧作家中最具独创性、最有天赋的一位” (Nightingale 14)。作为邱吉尔代表作品之一,《顶尖女子》新颖的叙事手法受到评论家的赞扬,但也因给观众“造成太多困惑而受到其他人的谴责” (Keyssar 215)。一些批评家认为,该剧虽然展示了女性通过复制男性等级制最恶劣的特征来建立女性等级制的不良后果,但“未能提供被定义为‘女性拒绝将父权制内化’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愿景” (Pfaelzer 287), 认为“邱吉尔不仅创造了一个凄凉的女性反乌托邦,而且暗示了女性交流的可能性” (Reif 87)。邱吉尔并不认同那些认为她“既过于乐观又过于悲观 (……) 还有过于哲学化和审美化,不够政治化” (Keyssar 215) 的指责。本文试图回到该剧发生的历史语境,围绕马琳的伦理选择这一伦理主线,剖析马琳的多重伦理身份引发的伦理困境以及马琳最终做出的伦理选择,挖掘其中深刻的伦理内涵。

一、伦理环境的历史再现

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有其历史的客观性,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必须“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

语”14)。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社会伦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英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职业、婚姻及家庭等方面。战争期间，由于劳动力短缺，女性代替男性进入各行各业，并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这一经历使女性认识到她们的工作能力并不亚于男性，她们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成为“贤妻良母”。此外，英国政府的政策也对女性外出工作给予了支持。1919年，“性别失衡法”规定不能因性别原因妨碍女性工作的权利。特别是，1960年以来，全球性女权运动的兴起使女性的独立意识再次高涨，加上第三产业的兴起，英国女性的就业率快速上升。1970年颁布的“同工同酬法”及“性别歧视法”，再次为女性的平等就业提供了保障。职业性别隔离（sex segregation）现象的改善大大增加了女性获得和男性担任同等职位的机会，改变了女性的就业结构，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高层次的职业中去。《顶尖女子》中的马琳就是这一变化的绝佳例证。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击败男性竞争者，荣升公司总经理。

表面上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对其命运有了多种选择，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能够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机会。然而，战争对英国女性产生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女性的形象和现实的‘适当’的角色并没有改变”（Marwick 120）。这一说法看似绝对，却也反映了一种基本的事实。女性就业的迅速增长使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但也伴随着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变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职场担任要职。但是，中产阶级出身的撒切尔夫人登台后重新倡导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倡导女性回归家庭。显然，这使女性陷入了工作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之中。女性为了获得职场上的成功，不得不在工作和婚姻家庭之中做出选择。

不论历史上不同时期女性所处的伦理环境如何变化，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她们始终肩负着其伦理身份所赋予她们的伦理责任。身为“顶尖女子职业介绍所”总经理，马琳行事果断，作风泼辣，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职场女性的典型代表。她在职场上的成功是以牺牲家庭和婚姻幸福为代价的。职位晋升本应得到家人和朋友的祝福，但在庆功宴上，马琳邀请的却是五位“女鬼”。事实上，马琳选择五位“女鬼”来为自己庆祝，只是因为她们这些所谓的“成功女性”都有着极其相似的伦理身份。五位“女鬼”分别是来自19世纪的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13世纪日本皇室宠妃兼尼姑二条（Nijo）、虚构的9世纪女扮男装成为教皇的琼（Joan）、16世纪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16世纪画作中的主人公杜勒·格里特（Dull Gret）以及中世纪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温顺的妻子格丽泽尔达（Griselda）。她们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上得以留下名字的女子，是马琳心目中“成功女性”的代表。

第一幕中，五位“女鬼”身着属于自己时代和表达身份的服装陆续登场，形成一副跨越时代的超现实画面。通过将历史上不同时空的“顶尖女子”聚

集起来，邱吉尔看似向读者展示一副跨越地域、民族、阶级和文化的女性成功景象，实则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由于伦理身份而经受的悲惨遭遇。不同时期女性所处的伦理环境得到真实再现，强调了伦理身份与其伦理选择的不可分割性。显然，邱吉尔不是简单地把史料变成文本，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再书写，构建了探讨历史与现实的当代文本。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上层阶级女士，伊莎贝拉在维多利亚固有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已将父权制内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女儿的伦理身份导致她凡事需按父亲的意愿行事，视父亲为精神支柱。她时常陷入矛盾：“我渴望回家，但回家干什么？房子太阴沉（dismal）了”（Naismith and Worrall 108）¹。显然，她选择以旅行为借口逃避家庭环境，带给她的却是压抑和痛苦。第一幕结尾，她发出了呼喊：“啊，多么痛苦！”（139）。二条的一生也同样充满坎坷。作为宠妃，皇帝就是她的一切，失去皇帝的宠幸就失去了宫廷生活的意义。因其宠妃的身份，她不能和自己的孩子相见，也从未体验过母子亲情。在当时社会伦理环境下，作为妻子的二条只能听从夫命。丈夫死后，她又不得不听从父命，做了尼姑。显然，二条的悲惨遭遇与其妻子和女儿的伦理身份紧密相关。格里特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相继被杀，母亲的身份使她决定替儿报仇。她身着围裙，头戴盔甲，带领一众村妇闯入地狱与魔鬼决斗。琼因女扮男装担任教皇一职而著称于世，但却因生孩子暴露了女性身份而被乱石砸死，连她刚出生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于难。琼和马琳的对话展现了当时女性所面临的残酷的生存环境：

琼：我敢肯定其他教皇都有孩子。

马琳：可他们没有生孩子。

琼：没错！我本不该是个女人。女人、孩子和疯子是无法成为教皇的。（120）

显然，琼是因其男性身份而成为教皇的，与女性身份没有关系，这反映了父权制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教育与职业的限制。格丽泽尔达在婚后近20年内不断受到侯爵违背人性的考验，不能与孩子相见，但她依然坚称“妻子遵从丈夫，天经地义”（129）。尽管格丽泽尔达极力辩解，但酒后的她还是吐露了心声：“要是沃尔特（侯爵）没有做那些考验该有多好啊！”（138）格丽泽尔达因妻子的身份强迫自己按当时的伦理纲常行事，无疑成为了维护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牺牲品。

这些历史上的“成功女性”都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五位“女鬼”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人生选择故事，让读者和观众得以了解特定历史时期

¹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Naismith, Bill and Nick Worrall, eds. *Caryl Churchill: Top Girls* (London: Methuen Drama, 1991)。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文中引用的文本均为笔者所译。

女性更为真实的生存伦理。正如克里泽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女性“仍然锁定在自己独特的视角中”（Kritzer 14），她们“完全吸收了她们的父权文化，以至于她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极度内疚”（Ammen 88）。五位“女鬼”的故事看似独立的叙事线索，实则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她们讲述的故事都是围绕家庭和婚姻生活展开并且都与她们的伦理身份相关。以马琳这位当代职场上的“顶尖女子”为代表，可以探究以其为代表的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职场女性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关系，挖掘该剧背后深刻的伦理内涵。

二、马琳的伦理身份与伦理困境

《顶尖女子》中马琳身上的多种伦理身份，是导致其身陷伦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剧中的马琳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公司的总经理，作为职场上的“顶尖女子”，马琳不得不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由于人的身份是其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因此个体也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伦理身份会对主体的行为产生约束，一旦这些伦理身份之间发生冲突，就会导致伦理混乱，从而使身份主体陷入伦理困境。在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中，马琳无法对其在职场和家庭中的身份进行调和，毅然选择做职场的“顶尖女子”，最终因身份导致其陷入职场和家庭的伦理困境。

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选择在职场担任要职，但女性在职场的生存绝非易事。为了获得成功，实现经济独立，这些女性都根据自己的职场身份进行选择。她们虽独立坚强、精明能干，但她们因为自己的选择逐渐在残酷竞争中消解女性的身份特征，增强了男性身份特征。为了保住公司的职位，“顶尖女子”马琳必须遵循职场生存法则。她干劲十足，与同事竞争职位，并选择保持单身。持续的竞争选择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特殊的伦理环境，离婚率不断上升，女性对结婚的热情不断减小，结婚年龄不断推后。

马琳职场上的“总经理”的身份常导致其陷入伦理困境。作为顶尖女子职业介绍所的职员，马琳是当代“成功女性”（high flyer）的代表。凭借其出众的才能，她击败霍华德当上了总经理。霍华德遭受打击住院，他的妻子来到公司向马琳求情，希望马琳将总经理的职位让给霍华德。在她看来，是马琳的女性身份导致霍华德病情加重，如果是其他男性当选，霍华德会认为是正常的。她尽力搏取马琳的同情：“他（霍华德）有家要养，有三个孩子，这个职位给他才是公平的”（189）。为了维护霍华德的自尊，她还请求马琳不要将此事告知霍华德。遭到马琳的拒绝后，基德夫人变了脸色，指责马琳不近人情：“你的结局一定很惨。你不正常（not natural）！”（189）马琳虽然表面上对此不以为然，但她无法解决作为职员的职业选择与作为女性的家庭选择之间所产生的矛盾，无法消除自己的选择给自己带来的内心痛苦。马琳为了获得职场上的成功，她没有按照其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进行选

择，相反在自己的职业选择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伦理观点。她在对珍妮的面试中说，如果不要孩子，她或许可以找到有前途的工作。为了保住职场地位，马琳可以选择不要亲情，为了摆脱原生家庭带给她的伤害，她宁愿选择与女儿和父母断绝关系。

作为家庭生活中的母亲、妻子和女儿，马琳常常陷入伦理困境中。首先，马琳未婚母亲的身份给她带来生活上的困扰。17岁时，马琳在懵懂无知的年纪意外怀孕，成为单亲妈妈。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在生下安吉后便选择将其留给姐姐乔伊斯抚养，独自一人到伦敦闯荡，最终脱胎换骨，成为职场上的“顶尖女子”。然而，马琳的内心并不轻松。作为安吉的生母，她从未感受过母女亲情，从未履行过母亲的伦理责任。马琳深知，一旦选择与安吉相认，她就必须履行母亲的责任。她的生存困境让她不得不做出放弃作为母亲的选择。其次，为了保住工作，马琳主动放弃了妻子的伦理身份。在与乔伊斯的争吵中，马琳坦白自己曾流产两次，并称不想要孩子。在她看来，那些喜欢她这种“顶尖女子”的男性都希望她变成回归家庭的小女人。马琳不能选择婚姻束缚自己。在职业和婚姻的选择中，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最后，为了获得经济独立和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马琳放弃了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与父母分道扬镳。对马琳来说，父母并未给她带来温暖和关爱。她甚至称自己的酗酒和有暴力倾向的父亲是“杂种”，认为母亲和他结婚简直是浪费生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马琳萌生了选择离开的念头：“我在13岁时就知道我必须离开，离开他们的家，离开他们，我不会重蹈这样的覆辙/我不会让他掌控，我要走自己的路”（231）。事实证明，马琳确实如其所愿，成为了职场上的“顶尖女子”，彻底脱离了贫穷和原生家庭。遗憾的是，事业上获得成功的马琳并没有改变家庭状况，她的母亲依然生活在父亲的暴力威胁之下，她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敢相认。正像乔伊斯所说，“你（马琳）是一直在前进，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231）。显然，母亲、妻子、女儿等多重身份并没有让马琳摆脱伦理困境，她的最终选择也不能避免其伦理悲剧的发生。

三、马琳的多重身份与伦理选择

人的身份具有社会属性，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往往拥有多重身份，由此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作为职场上的“顶尖女子”，马琳既精明能干又心狠手辣。然而，表面风光的马琳却因其多重伦理身份而常常陷入伦理两难。“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7）。马琳作为母亲、妻子、女儿的多重身份与其伦理选择交织在一起，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她在家庭与工作之间苦苦挣扎，在权衡利弊之后毅然选择了后者，以其职业身份取代了家庭伦理身份，成为职场中令人羡慕的“顶尖女子”。正如凯撒尔所说：“马琳是一个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女人，一个我们既不能简单谴责也不能简单崇拜的女人”（Keyssar 215）。马琳虽然获得了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但同时也因其选择造成了她在工作中孤军奋战，家庭中母女分离、姐妹分歧、父母疏远的后果。

在社会关系层面，作为“顶尖女子职业介绍所”的总经理，马琳理应有广泛的社交，但是作为职场女强人，马琳视撒切尔夫人为偶像，称其为“坚强的女士”（229）。她崇尚个人主义，明确表示“我不相信阶级。一个人只要肯干就没有干不成的”（233），并将这一观点视为自己的工作法典。因职场中的尔虞我诈，她总是独来独往，与同事也仅为泛泛之交。马琳更是有意回避家庭这一话题，因为她“从没提到过她的家人”（200）。作为“顶尖女子”，马琳的职场身份决定了她无法与同事保持友好的关系，更无法与家人亲近。

作为安吉的母亲，马琳并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对安吉的成长并无关心。当她和乔伊斯抱怨对安吉知之甚少时，作为养母的乔伊斯对此颇为不满：“你不了解她（安吉）又不是我的错，你从来不来看她”（205）。马琳选择放弃作为母亲的身份，使她的女儿受到伤害。安吉性格中的缺陷不断增强，她只倾向于和年龄比她小的孩子玩耍，“愚蠢、懒惰、胆小”（233）。马琳对女儿成长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

马琳总是逃避作为女儿和母亲的责任，这在客观上影响了马琳与乔伊斯的姐妹亲情。马琳与乔伊斯一见面就剑拔弩张，两人之间的对峙形成了一种萧伯纳式的辩论格局。乔伊斯痛恨马琳舍弃女儿的无耻行为。在乔伊斯眼里，马琳自私自利，“除了自己什么也不在乎”（231）。她认为马琳的成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她一个人的成功是没有价值的。乔伊斯将马琳归为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一派，称他们都是“道德败坏的杂种”（229）。对于安吉的抚养问题，乔伊斯同样对马琳的行为表达了不满，“我不明白你如何能够离开自己的孩子”（221）。当乔伊斯说出自己为了照顾安吉而导致流产并因此失去成为母亲的机会时，马琳坦言自己也曾两次产流，因为孩子会影响她事业的发展。可见，舍弃安吉对马琳来说其实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她也曾在母亲和总经理的身份之间犹豫，但目睹了母亲悲惨的生活的她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母亲的身份，选择成为职场中的“顶尖女子”。马琳所经历的种种选择，正是个人特定身份影响一个人伦理选择的结果。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批评家能够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而不是在远离历史现场的假自治环境（false autonomy situation）中评价文学”（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0）。邱吉尔选择以马琳这位职场女性作为叙述对象，也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国内外形势。邱吉尔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多次听到女性可以成为商界高管的消息（Aston and Diamond 30），这为她在剧中设定的情境提供了具体真实的素材。1979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了所

谓的“撒切尔奇迹”。但撒切尔夫人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与其所奉行的政策加重了社会不公，下层民众怨声载道。英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倡导的“公平竞争、体面宽容、承担责任、崇尚互利”（瞿世镜 任一鸣 15）等观念逐渐消失。马琳是这一时期英国职场女性的代表。为了获得成功，她必须用男性的成功准则要求自己，在竞争的压力与职场的尔虞我诈中变得冷血无情。马琳做出的伦理选择是其在生活重压下的无奈之举，不能承担母亲、妻子、女儿的责任是导致家庭伦理悲剧的直接原因。

《顶尖女子》中涉及个人责任的伦理问题丰富而深刻。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接替撒切尔夫人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所说：“我们之所以有人性，是因为我们发展了对自己和对他人承担个人责任的道德力”（托尼·布莱尔 346）。邱吉尔正是通过展示马琳伦理选择带来的负面影响，警示读者和观众在做出伦理选择的同时不能忽视身份赋予的伦理责任和义务，《顶尖女子》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道德启示。

邱吉尔的《顶尖女子》聚焦马琳的多重伦理身份，以马琳的伦理选择为叙事主线，通过反面的道德事例展示当代英国职业女性面临的伦理困境，带给读者和观众伦理思考。马琳未能承担家庭的伦理责任，其做出的伦理选择导致了母女分离、姐妹分歧、父母疏远的家庭伦理悲剧。邱吉尔在《顶尖女子》中对伦理因素格外关注。1991 年该剧复演，不仅成为整个撒切尔时代的压卷之作，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和生活的伦理选择范例。

Works Cited

- Ammen, Sharon. "Feminist Vision and Audience Response: Tracing the Absent Utopia in Caryl's *Top Girls*." *Utopian Studies* 1 (1996): 86-102.
- Aston, Elaine and Elin Diamond,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y to Caryl Churchill*.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9.
- Keyssar, Helene. "The Dramas of Caryl Churchill: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1 (1983): 198-216.
- Kritzer, A. Howe. *The Plays of Caryl Churchill: Theatre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1991.
- Marwick, Arthur. *Total War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88.
- Naismith, Bill and Nick Worrall, eds. *Caryl Churchill: Top Girls*. London: Methuen Drama, 1991.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Basic Theory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Nightingale, Benedict. "Chairwoman of the Boards." *The Times* 13 (2006): 14-15.

Pfaelzer, Jean. "Changing of the Avant-Garde: The Feminist Utopias."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15 (1988): 282-294.

瞿世镜、任一鸣：《当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Qu Shijing and Ren Yiming.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Reif, Jan. "Women in Retreat: The Politics of Separatism in Women's Literary Utopias." *Utopian Studies* 2.1/2 (1991): 131-146.

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

[Tony Blair. *New Britain: My Vision of a Young Country*, translated by Cao Zhenhuan.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Co. Ltd., 1988.]